

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

劉良佑 主編

織繡

武敏 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

劉良佑 主編

織繡

武敏 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織繡／武敏著．--初版．--臺北市：幼獅，
民81

面；公分．--(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

ISBN 957-530-345-8(精裝)

1. 古物志-中國 2. 紡織 3. 刺繡

796.95

81003441

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

織繡

企畫 幼獅文化公司編輯部

主編 劉良佑

著者 武敏

校對者 陳肇健·陳小萍

出版者 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鍾桂

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

電話：(02)2311-1831、2311-1839

門市：①臺北市衡陽路6號(02)2314-1420

②臺北市松江路二九號(02)2501-5858轉108

③臺中市逢甲路2-1號(04)251-1942

④高雄市中正西路188號(07)281-1784

郵撥：000173722號

排字 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定價 一五〇〇元

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二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79001

ISBN 957-530-345-8 (精裝)

「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總序

中國是世界古文明國家之一，悠久的歷史、遼闊的土地和豐饒的物產，以及不同民族多樣的人文景觀，交織出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也留下了無數的珍貴資產。其中最令人目眩神馳的各種古文物，不但早已在人類藝術史上大放異彩，它們所蘊涵的先民智慧，更是令人贊歎不已；睹之怎能不令人油然而生歷史情懷？

然而隨著社會型態與生活方式的急遽變遷，國人卻已逐漸忘卻先民締造的優雅文化。是由於時空的阻隔？還是由於無從認識、了解而產生的漠視與輕視呢？經過不斷的思索，我們終於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從沒有人配合著現代人的環境與生活，以淺明易懂的方式，正確而完整地把中華文化的精髓傳達給廣大的群眾。也鮮有人告訴我們只要用自己的眼、自己的心去感受藝術，任何人都具有感受美的天賦，都能培養出品賞藝術的能力，就像先民一樣，以平凡素樸的心，自然就能渾然天成的創造出精巧無比的藝術品，也能無礙的享受藝術所帶來的喜悅。

雖說藝術並非生存所必須，然而，少了它，整個歷史文化將呈現一片死寂與空白，個人生活也將因之單調無趣。基於此，身為炎黃子孫且從事文化工作的我們，自應責無旁貸的負起這傳承歷史與美化人生的文化使命。我們也深深體會到從時代洪爐中所淬鍊出的人，要有建設時代、開創新局的抱負；從社會的賜與中成長茁壯的人，當具關懷文化、回饋人群的心願。因此，我們精心策畫了「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結合了海內外古文物方面最權威的專家共同撰寫，除了幫助讀者培養品賞古文物的素養，增加精緻生活的素質外，也提供文物收藏者作為鑑別參考之用，當然，這更是展現中國人高深智慧與追求真、善、美的一大創舉。

做為一個文化機構，幼獅公司的一貫目標即是「以服務散播書香，以書香美化社會」。我們衷心希望這套「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能為現代人開啓一扇認識歷史的大門，引領讀者步入泱泱華夏的文化殿堂。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輯部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編序

中國人一向是個好古敏求的民族，遠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人們，對於文物藝術品的價值到底何在？就曾經引起了一系列的論證。從流傳下來的古籍中，我們發現，當時對文物價值的看法，不外乎兩種：一種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認為人世間之物，不僅有生活上實用的價值，也有精神上的意義。好比鐘、鼓、玉、帛等等，就不能僅僅從實用的價值方面去看，因為一個國家社會的安定和發展，除了功利的架構之外，道德和禮樂的內在連繫，甚至更為重要。因此文物所具有的造形、紋飾、色彩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義。當然，就那個時候的情況來看，孔子的觀念，有相當高理想化的成分。在大部份的百姓，日日生活於戰爭的陰影下，如何溫飽都是問題的時候，稍晚於孔子的墨子和韓非子，不免對孔子的觀念有所反駁，認為費財勞力又不足以利人的文物，實在不應當視之為什麼寶物。而且就實際的觀點來看，一個瓦鉢的功用，顯然比一個玉杯要強。

從上面兩種不同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這是基於不同的思想層面所發展出來的兩種看法。從今天社會的背景來看，這個爭吵了幾千年的「玩物喪志論」和「禮儀教化論」，都已經不合時宜了。一方面，現代社會的發展，促使文物藝術品成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理財工具，只要處理得當，比土地和房屋更加寶貴。另一方面，事實證明歷代流傳下來的文物，為政治和教化服務的作品，畢竟是極少數的，透過對文物的研究和鑑賞，不但可以充實現代人的休閒生活，更能鑑往知來，對今天文物藝術的發展，具有借鏡的作用。因此，為了服務社會大眾，幼獅文化公司編輯部乃規劃出版這一套「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以推廣文物鑑藏的知識和興趣。

由於文物鑑藏，是因應現代文物流通及真偽鑑定的需要而新興的一門學術，因此它是一種以文化史為基礎，結合考古學、民俗學、美學，以及現代科學的各種檢測技術所形成的一種綜合性知識。為了滿足以上的要求，本叢書在編輯的方向上，對於文物歷史的考據、出土文物的引證、參考圖片的欣賞等等方面，都作了通盤的考量，希望透過本叢書各冊的陸續刊行，能對文物藝術品的愛好者，提供一些實質上的幫助。

本叢書的撰寫，首次結合了臺灣、大陸和香港三地的學者，共同參與了這項艱鉅的工作。儘管兩岸學術界因長久的分隔，在思想和觀念上難免有些不盡相同之處，但在誠信互動的基礎上，終能使學術交流向前踏出了穩定的一步。謹在此對參與此項工作的同仁致謝，同時也請社會賢達給予批評指教。

劉良佑

自序

我國是蠶絲的故鄉，也是絲織印染刺繡的發源地。早在兩千多年前，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中國華麗的絲綢錦繡不斷運往西方，飲譽海外並為我國贏得「絲綢之國」的美稱。只是由於古代織繡品大都用作服飾，除宋元以後有少量供觀賞的絳絲、繡品等得以傳世者外，大抵難以保存至今。本世紀初，沿絲綢之路的新疆、甘肅等地雖曾先後發現過一些漢、唐錦繡，但大都被盜往國外，為外人壟斷，遂使國人對我國古代織繡無從進行系統研究。

值得慶幸的是，近三十餘年來我們在新疆民豐、吐魯番等地又先後分別發掘到大量漢、唐織繡，繼而全國許多省區也陸續出土了不少從史前、先秦、兩漢至宋遼金元與明代的織繡品，近年新疆地區更不斷有先秦、兩漢毛織毛繡品出土，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古代織繡作系統地觀察，進而揭示其發展源流。

本書以新疆博物館收藏的織繡品為主，並盡可能收錄了其他省區有代表性的最新出土織物及館藏傳世繡品，全面性、系統性地向讀者展示我國自史前以至明清的織繡歷史，並配有數百幅彩版和線圖，以便讀者具體地瞭解不同時期各種織物的品類與風格。

筆者任職於新疆博物館三十餘年，除完成本職工作外，長期潛心於館藏織繡品的整理研究，在既缺參考資料又無所師承的條件下，依靠個人堅持不懈地

努力，從細心觀察實物繪製結構圖入手，通過反復模擬實驗，對織物織造、染色、印花、刺繡針法等諸種工藝逐漸有所認識，有所發現。貫穿在本書中的不少個人觀點與發現，或修正了前人以往所見的疏誤，或填補了過去史籍記載之空白。因此，本書是筆者積數十年研究之心得，也凝聚著本人半生心力。如果讀者諸君能從本書領會到中國古代織繡工藝的精妙，進而從這一視角體察到中華文化具有多麼悠久、光輝的歷史和高超成就，激發起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熱愛和作為龍的傳人應有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為弘揚我中華文明而同心協力進取，那將是筆者最大的心願。

一切事物總是在不斷發展，每個人的認識能力均有一定局限，本書自不可能是一部完美之作。隨著新出土實物資料的不斷發現，我們的認識將會進一步深入，研究也將向更高水準發展，個人在本書中的某些看法，也將受到客觀事實的檢驗。筆者誠懇地期待著讀者諸君對本書提出批評指正，以期將來有所補充修訂。

筆者在對中國古代織物學習探索過程中，曾蒙我國已故紡織史學家王若愚教授、考古學家夏鼐教授、歷史文物學家沈從文教授等前輩不時賜教，多所獎掖，謹以此書答謝上述諸前輩的關懷。

此外，本系列叢書策劃者劉良佑教授不僅給我以鼓勵，更在百忙中為本書作了最後校正；我國著名文物攝影家玉露女士代為攝製彩版，使本書增色不少；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輯部諸同仁如劉元陵小姐、簡國榮先生、陳婉容小姐等，先後為本書出版傾注心力。借此機會謹向他（她）們致以由衷的感謝！

武敏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
於烏魯木齊

目錄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紡織

第一節 衣服出現與紡織的起源

第二節 我國原始紡織原料與纖維加工

第三節 我國史前時期織物的組織結構

3 5 8

第二章 工藝漸趨完備的先秦織繡

第一節 商代出現的提花絲織品——綺

第二節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織繡的新發展

第三節 近年出土的戰國錦繡

第四節 新疆近年出土的先秦毛紡織品

第五節 彩色紛呈的戰國染色

1 7 8 1 1 3 4

第三章 先後輝映的西漢彩繡與東漢織錦

第一節 西漢絲織物寶庫——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5 1

第二節 絲路開通與新疆出土的漢代絲織品

6 0

第三節 兩漢錦繡之異同

7 2

第四節 新疆出土的兩漢時期毛織品

7 8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織繡

第一節 何以蜀錦獨稱妙

9 7

第二節 吐魯番出土的織成與錦繡

9 8

第三節 高昌地產織錦

1 1 1

第五章 絲織工藝大發展時期

——隋唐的錦繡與印染

第一節 隋唐織染生產概況

1 1 9

第二節	吐魯番出土的隋唐錦、綺、綾、紗、羅	1
第三節	隋唐印花與刺繡	2
第四節	隋唐織物紋樣	0

1
5
4

第六章 宋（遼、金）元織繡與刻絲

第一節	宋元絲織概述	1
第二節	宋錦與蜀錦及遼、金、元織金	7
第三節	兩宋單色紋織物的勃興	1
第四節	宋元刻絲與刺繡	3

1
9
6

第七章 明清織繡的新成就

第一節	明清兩京織染與江南二織造	2
第二節	絢麗多彩的南京雲錦	1
第三節	蘇州織成與宋式錦	4
第四節	明清織繡的紋樣特點	1

2
3
4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紡織



作為全書的序篇，在本章裡我們向讀者們介紹我國原始紡織的起源，所用纖維材料，以及原始織物的組織結構。

在這一章裡，我們首先從人類衣服的起源談起，因為紡織品的發明及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發展，主要是為人們提供衣服用料。接著，我們以考古學資料為依據，結合史前社會學、民族學的有關資料加以對比研究，並與我國先秦典籍中有關記載相互印證，探討中國原始紡織的發生發展，植物與動物纖維材料的發現和利用，原始紡織的工具狀況及織物的組織特點。為了使讀者們對原始紡織獲得直觀認識，在本章中我們還附用手繪墨線圖八幅，分別展示了一些原始紡織機具、原始織機的操作及織物的組織。

本章援引的各種資料，都經筆者以審慎的態度逐一加以分析，對其中某些曾引起爭議的資料，則於對比研究之後提出我們自己的見解。

中國是蠶絲的故鄉。絲織生產在我國各個歷史時期均處於領先時代的地位，代表著當時紡織生產工藝的最高水準，因此，在這一章裡我們著重對蠶絲的發現和利用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探討。這是因為本書以後各章所論各個歷史時期的織繡，也都以絲織品為主要對象。

任何文化總是由低層起步，向高層發展，織繡自然也不例外。本章中揭示的我國原始紡織雖然顯得拙稚，然而如今飲譽世界的中國織繡卻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提起紡織品，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日常衣著。衣食住行四件事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我國人通常卻把「衣」放在首位，說明對衣的重視，這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求食、棲息（住）、行走（包括飛翔、游動等）是所有動物的本能，非人類所獨具，只有謀衣才是人類從長期生活積累中形成的有意識行為，且為其他動物所不備。其他動物出於本能，或以羽毛增褪，或以蟄伏，或以遷徙（如候鳥等）以適應寒暑之變化。當然，這並不是說人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僅在於是否穿著衣服。不過自從人類出現衣服起，服裝用料與款式就成為衡量人類社會文明程度和區別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尤其是在紡織品出現並用於衣服原料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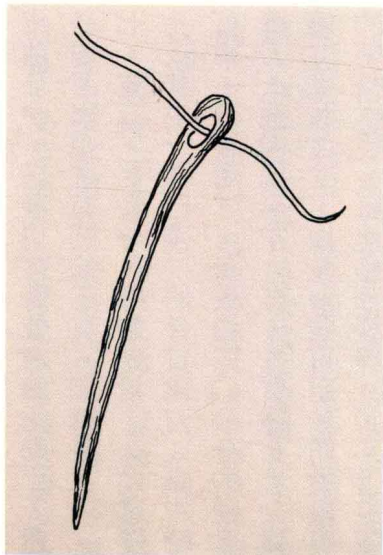
衣服出現雖說是人類有意義的行為，但最初的動機未必是基於對美的追求，很可能是為了適應自身生存的需要。然而隨著社會的前進，人們愈來愈離不開衣服，並且隨著衣服原料的不斷發展，各種不同工藝層次的紡織品逐漸成為衣服的主要用料，而衣服也由防寒避暑轉向對美的追

求，成為人類美化自身的一種手段。因之已成為衣服主要原料的紡織品也逐漸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由初加工到反覆多次的再加工，品類漸趨繁多，色彩愈益繽紛，乃至成為研究人類社會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一節 衣服出現與紡織的起源

迄今為止，有關衣服的起源依然是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有人說是為了「遮羞」，有的認為源於「保護性器官」，有人認為出於「禦寒」，也有人歸之於美化自身的「裝飾」需要，而多數人意見則籠統地歸之為了「遮護身體」，等等。我們無意參加這種爭論，但個人認為衣服的起源仍需從人類最原始的生產方式——狩獵活動中探求。比如說，獵手們披上獸皮或植物枝葉為「偽裝」，以便盡可能接近獵取對象，提高狩獵的成功率；同樣，用這種「偽裝」模擬狩獵場景也可培訓年輕的獵手，或者慶賀狩獵的「豐收」。

久而久之，人們逐漸感覺到身披獸皮或植物枝葉可以禦寒蔽暑，於是出現了原始的「衣服」——將連綴起來的樹葉或獸皮披在身上。這大約發生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的奧瑞納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已發現骨製錐、針，梭魯特（Solutrean）文化晚期更出現了帶孔骨針。用這種骨針可以連綴獸皮，縫製衣服。類似的帶孔骨針，一九三三—三四年在我國北京附近的房山縣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也有發現（插圖一），地質年代當晚更新世末，據放射性碳素斷代，距今約一八八六五±四二〇年，與梭魯特文化晚期相當。這就是說，至



插圖一 山頂洞人遺址出土的骨針

遲在一萬八千年前，生活在歐亞大陸的原始居民已經穿上了用骨針縫製的皮毛衣服。

根據我們以上對服裝起源的判斷，人類原始服裝的用料最早應是動物皮毛與植物莖皮或枝葉。這與我國一些古籍中的記載也頗一致。《春秋命曆序》有云：「民始穴居，衣皮毛」、「古初之民，卉服蔽體」；《五經異義》也說：「太初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①。《韓非子·五蠹》所謂「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其實當時尚未出現農業，自然談不上男耕女織之事，不過確實說明了作為紡織品布帛的出現，顯然要比衣服的出现晚得多。

原始紡織起源於編結。民族學、考古學與史前社會學的研究資料表明，世界上許多民族的紡織技術萌芽，大都在製陶術出現之前。例如，原來居住在澳大利亞，現已滅絕了的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過著漁獵與採集生活，不知有陶器，處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階段，他(她)們長

年大部分時間赤身裸體，只有在寒冷季節才用袋鼠皮圍護身體，但卻能用草或毛編成囊袋和籃子，搓捻成繩。塔斯馬尼亞婦女甚至能用一種植物的狹長乾葉編成極其緻密、可以盛水的籃子。他們也會編織捕魚用的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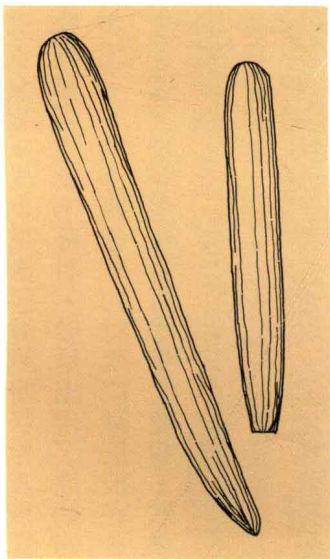
原始編結的實物很難保存到今天，藉助於民族學資料，我們可推知當時使用的原料大致有植物的枝葉、韌皮與藤蔓，動物的毛絨和皮條。編結的成品有繩索、網罟、蓆子、風籬、囊袋，以及籃筐等。利用纖維(如獸毛和植物韌皮等)加捻、搓成繩索，是為紡績的濫觴。纖維紡績為紡織的發明準備了條件。

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出現了農業和製陶，開始了定居生活。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遍佈中華大地的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先後被發現並揭示出來。在各地先後出土的大量史前文化遺物中，不僅有用於紡績的陶、石紡輪，甚至還發現有紡織品的印痕與實物，標誌著我國自新石器時代起，先民們已開始紡績纖維並用以織布。

在距今約七千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已發現有蘆葦編織的蓆片，還發現了與織造有關的工具，如殘長三一·七，寬三·七公分、磨製光滑、一頭帶雙孔(其中一孔已殘)的骨質緯刀(織布時打緯、分經用)，及長逾四〇公分的硬木緯刀(插圖二〔左〕)，木質捲布棍(插圖二〔右〕)，以及一些可用於紡織機具的細長木棍(可能是分經桿)②。這說明當時已有原始織布機。

在時代大致與河姆渡文化相當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遺址裏，出土的陶器底部不僅發現有清晰的編織物印痕，還有布紋印痕，說明當時已有了原始紡織品——可能

插圖一 河姆渡史前遺址出土的木質織具



是用麻類纖維織成的布③。

一九七二—七三年，在距今約六千年前的馬家浜文化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中，出土了三塊炭化紡織品，經鑒定是用野生葛的纖維紡織而成。這是目前所知我國年代最早的紡織品實物④。

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在距今約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裏，發掘出有麻布實物，和用家蠶絲織成的絲帶和絹片⑤。這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標誌著我國原始紡織技術在五千年前已達到一定水準。

第二節

我國原始紡織原料與纖維加工

世界各地史前期原始紡織原料均取自天然的動、植物纖維，開始是取自野生的，以後則逐步加以馴化。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提到，我國原始紡織原料有葛、麻和蠶絲。此外肯定還有毛。這些天然纖維的發現和利用，主要應歸功於當時的婦女。因為早在舊石器時代，男性大抵從事漁獵

，而婦女則從事採集。採集的對象包括一切可以果腹的植物果實、種籽、根莖、枝葉，以及鳥類的卵，乃至昆蟲及其蛹。求生的慾望與獲得食物的喜悅促使她們向地下挖掘，往樹上攀登，細心地觀察與尋覓，這就有可能從連續不斷的生活實踐中發現有用的天然纖維材料。

(一)葛 豆科多年生蔓草，莖長可達八—一〇公尺，根富澱粉可供食用，藤蔓纖維可用為紡織原料。葛大概是我國史前時期居民最早用於紡織的植物纖維。婦女們經常採掘葛根為食，不難發現其藤蔓的韌皮纖維可用於紡績。《韓非子·五蠹》所說：帝堯之服「冬日覓裘，夏日葛衣」，葛衣即以葛纖維紡織的葛布縫製。這雖是傳說，但從吳縣草鞋山馬家浜文化層出土的葛布距今約六千年看，時代大致相當，是可以憑信的。草鞋山出土的葛布是用野生葛的纖維為原料，這在我國先秦時期依然如此。《詩經》中對此有相應的反映，如《王風·采葛》、《周南·葛覃》等章所見。《葛覃》所說：「是刈是漚，為絺為紵」，漚指煮漚，即將割來的葛蔓經煮

漚脫膠，加工成供紡績的纖維，然後紡織成細、粗不同的葛布，即「絺」與「紵」。

葛以野生為多，雖也有種植⑥，但其植株與生長條件似不宜人工於園田作大面積栽培，只能於山野種植，難以「馴化」，亦不易管理。若僅刈其藤蔓用為纖維，來年仍可再生；倘掘根取食，斷其生機，自然難以復發。我國野生葛的資源在先秦以前也許相當豐富，但長期無限制的採掘，自然日益減少。因此葛纖維材料來源難以為繼，逐漸為同樣古老的麻類纖維所取代。這是因為麻與葛相比，適宜人工大面積種植。

(二)麻 麻類品種甚多，原生中國並被先民最早利用、栽培馴化的主要品種有大麻、苧麻和苧麻。苧麻纖維較粗，不宜紡織，古代除用以織作喪服外，主要用於製造繩索。

大麻(hemp)亦名火麻、黃麻，桑科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異株，雄曰苧，雌曰苧。苧莖細長，高產早熟，韌皮纖維品質優良，可織上好麻布；苧的纖維不及苧

，只用於織粗布，但種子中含油約三〇%，我國古代視為上好食料，因此麻（籽）被列為九穀之一。大麻纖維的發現和利用，最初也許與採集麻籽為食料有關。據認為，「早在公元前二八〇〇年，中國已栽培大麻以取纖維」⑦。

苧麻（*renie*） 苧麻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皮的纖維含量高達七八%。苧麻強度高於亞麻、棉花或羊毛，具有抗濕、耐腐、散熱、潔白、質輕等優點，且易於染色，織物平滑有光澤，但纖維間缺乏抱合力，紗線表面多毛羽，紡織加工有一定難度。苧麻是我國的特產，河姆渡史前遺址出土有苧麻繩和苧麻葉⑧，錢山漾史前文化遺址所出麻布經鑒定亦為苧麻⑨，至今國外仍稱苧麻纖維為「中國草」，稱其織物為「夏布」或「中國亞麻布」⑩。

我國利用大麻和苧麻纖維為紡織原料的歷史與葛同樣古老，但比葛延續時間更長，也更普遍，直到棉花傳入我國並普遍種植，它在我國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才逐漸降低。

《詩經》中有關種麻、收麻、漚麻、

衣著麻布的記載甚多，如《齊風·南山》：「蓺麻如之何，衡（橫）從（縱）其畝」，說的是種麻；《豳風·七月》「十月納禾稼」下列舉收穫的穀物中有麻（籽）；《陳風·東門之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可以漚苧」，即將大麻莖桿、苧麻韌皮在池水中浸漚，藉水溫發酵，使其表皮與纖維分離，乃獲取麻、苧纖維必需的過程；《曹風·蜉蝣》有「麻衣如雪」，喻麻布衣服之美好。自先秦至兩宋，麻布不僅是我國大多數民眾的主要衣料，也是大部分地區農戶向政府輸納的主要實物租稅之一。大麻與苧麻紡織品在我國古代是明確區分的。麻布特指大麻織物，而苧麻織物則稱「苧布」或「紵布」。

（三）蠶絲 中國是蠶絲的故鄉。本書以下各章所敘，將以蠶絲織繡品為主要內容，因此在這裏我們不得不對蠶絲多花費一些筆墨。蠶絲取自蠶繭。說到蠶繭，人們自然會聯想到一九二六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那件「半割」繭。這繭殼作為「國家的重寶」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對這繭至今依然存在爭議，

不僅有家蠶、野蠶繭、桑螵繭之爭，甚至有的懷疑它是後世混入的⑪。

西陰村遺址的發掘者李濟先生在報告中寫道：「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記；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功的割裂」，而「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⑫。在這報告發表四十六年之後即一九七二年，夏鼐先生著文對此繭的時代提出懷疑。疑點之一是華北黃土地帶新石器時代遺址文化層中，蠶絲之類不可能保存那麼完好；疑點之二是新石器時代不可能有那麼鋒利的刃器切割蠶繭並使其邊緣「極平直」⑬。李、夏兩位都是飲譽海內外的我國著名考古學家。作為後學，對這兩位前輩我同樣充滿敬意，既不敢懷疑李濟先生「不會是後來侵入」的判斷，也沒有根據對夏鼐先生的前一疑點置以可否。但對夏先生的後一疑點，據我所知，早在舊石器時代，人們從石核上剛打下的石片，其鋒利程度決不下於今日之剃刀⑭，用以切割蠶繭完全可以達到使割口極平直的效果。如果當時打製的